

论《周礼》建军模式与战国秦军制的差异

李严冬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周礼》王六军的建军模式与战国时期秦国军制具有不同的形态。《周礼》军队以“夫家”为单位,每家出兵一人,各级军队组织完全建立在民政组织之上。而秦国军制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根据所掌握的傅籍名册按照一定次序征发男子“更代”服役。军队组织已经脱离民政组织独立发展,以个人为单位统一编列。《周礼》的建军模式与《国语·齐语》所见春秋齐国军制类同,应该看作是对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军制改革成果追述。

关键词:《周礼》;军制;战国;秦国;春秋时期;军队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 9713(2015)02- 0237- 04

儒家典籍《周礼》中保留了大量反映军制的内容,历来为研究先秦历史的学者所看重。就其时代性而言,由于《周礼》所见军队的组建模式吸取了春秋以降基层乡里制度的发展成果,而与西周时期地方乡、州、里等族邑组织有明显差别,所以这一点成为众多学者判断《周礼》军制为战国军制写照的重要原因之一^[1],甚至认为《周礼》兵制直接采用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兵制为蓝本^[2]。本研究则认为,《周礼》之建军模式并不符合战国军制的一般特点。这一模式可以根据《周礼·天官·小宰》之言概括为“听征役以比居”^[3],与《国语·齐语》所见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4]之制相类。这种模式下军政组织完全合一,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其实是“夫家”而非个人,军队组织并非脱离以血缘为纽带的民政组织独立编列。而战国军制则根据户籍推行普遍兵役,以个人为单位编连成军,“傅籍”男子以一定“更次”轮番服役。军队组织与民政组织已经脱离。两者之间的差异明显。

一、《周礼》建军模式与秦军制的差异表现

战国时期,军队中的兵种主体已经由战车兵转为独立的步兵,而什伍编制是当时最为普遍的步兵编制方式。在战国所传兵家著作的记载中,此种情况不胜枚举。秦国军队也不例外,如《商君书·境内》载,“其战也,五人来(束)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5]。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屯表律》载,“军新论攻城,城陷,尚有楼未到战所,告曰战围以折亡,假者,耐,敦(屯)长、什伍知弗告,赏一甲,伍二甲”^{[6]145}。这都说明秦国军中有什有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7]289}。《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7]230}。有论者认为,这便是秦国军队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军队按什伍编制的社会基础。其实却不然。正如罗开玉所说,“在商鞅以前,‘伍’是兵、政合一的,主要是相互保护的基层组织。商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性质,使其主要具有相互监督的职能,兵政也开始分离”^[8]。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吴益中也指出,在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国基层组织中,看不出有“十家为什”这一级的组织存在,而往往是将里、伍连称^[9]。张金光亦持此论^[10]。这说明秦军“什”一级的军事组织,并没有地方行政组织与之对应。秦军之组织,恰恰是在军内以个人为单位编组完成,而与民政组织无关。

而《周礼·小司徒》中所载军制,其中所秉承的是“听征役以比居”^[3]的建军思想。要求“五家为比”而出军一伍(五人为伍)。由于征兵以“毋过家一人”为原则,即每家出一人作为“正夫”参军,所以又称为“夫家”之征。可见,《周礼》中关于军队建立的单位是一家一户的“夫家”,而并非全体适龄男子。正夫代表全家服役,余夫仅为预备兵源,仅参与田猎训练和追胥(抓捕盗贼)。《周礼》以“夫家”为单位依次建立伍、两、卒、旅、师、军各级军队

组织,与比、闾、族、党、州、乡等各级民政组织一一对应,从而建立了“王六军”。军队组织的构成完全依赖于民政组织建立并被固定下来。就兵种而言,又是战车、步兵混编,而以战车为主。这与战国兵制有本质的不同。

(一)征兵单位差异

《周礼》征兵,以户为单位,每家只出一人为正夫,以其余为羡卒(余夫)。战国时期则不然。各国经过变法,大都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度。国中适龄男子除少数“复除”者之外,全部纳入征兵范围,已经不再有正夫和余夫的分别。例如《史记·苏秦列传》载,“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7]2257}。由此可知,因为不再区分正夫和余夫,所以军中的编制组织已经失去了与地方民政组织一一对应的前提条件。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的兵制也是如此。商鞅在全国编户计口,掌握“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商君书·去强》)、“均出余子之使令”(《商君书·垦令》),以求统筹使用民力。“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7]2230},即是说虽然仍依旧按户征兵,但家中适龄男子必须分户,否则户赋加倍。战国后期至秦代,按户征役已经发展为按人征役,每户家中成年男子都需为国服役。《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可(何)谓‘匿户’及‘熬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殴(也)”^{[6]222}是其证。在掌握户籍丁口之后,秦国以一定次序“更代”使用民力,类似于后世的“番上”制度。《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11]1137}。这一制度要求,国中适龄男子登记“傅籍”之后,要在本郡服一年兵役,接受军事训练。其后还要到边郡或国都服一年戍卒(或卫士)兵役。前者为“新傅”者所服之役,同伍之各家是否有人出兵服役,全在于是否有新傅籍的适龄男子。而后者为未戍者所服之役,也需要由官方排定次序决定服役与否。秦代《戍律》虽然仍延续了同居之人不得同时征入军中行戍的传统,但征发兵役的单位毕竟已经具体到个人,户与户之间已经不再具有稳定的军事纽带。无论哪一种情况,同伍之家同时出兵在军中组成一伍的做法已经不再是秦国军制所必须要求的。

(二)军队组织编成原则差异

《周礼》王六军出于六乡,乡中男子全部接受射、御训练,一旦成为正夫就要和居住地同比同间的邻居一起编入相应的“伍”“两”当中,即战车编组。而战国时的兵种选拔,完全由军队根据一定军事标准来决定。不同兵种的训练方式也大相径庭。例如,《六韬·犬韬·武车士》载,“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馘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五车之士,不可不厚也”。同书《武骑士》云,“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馘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这种情况在秦律中也有所体现。《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载,“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赏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徭戍”^{[6]128}。可见,训练战车御者的时间,可以达到普通步兵的四倍,所以,同乡同里并不能成为编入统一兵种服役的标准,也就更不可能与军事编制单位统一起来。而《周礼》“王六军”则将全体六乡正夫按既有的民政组织固定编入战车部队中。

在军中通过简选组成精锐部队,是战国军队惯常的做法。《六韬·练士》云:“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有锐气、庄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又如《荀子·议兵》中所记齐国之技击、魏国之武卒、秦国之锐士,都是简选而得的勇士。这些人由募选而来,其编组方式更不可能与所在乡里有关。

在国家兵源不足的情况下,战国秦汉都曾选择谪发罪民从军,如《六韬·练士》云:“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7]253}。这些人都是因个人原因被征入伍,与所在乡里无关。此外,为免除亲人奴隶身份而要求服兵役者也是如此,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云,“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谪罪殴(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常(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6]91}。即为求亲人免罪而戍边一岁。以上种种,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编入军中的例证。

(三)军政分离要求不同

《周礼》中比、闾、族、党、州、乡等各级民政组织的官员同时就是伍、两、卒、旅、师、军各级军队组织的指挥官。而战国时期,周代寓将于卿、文武不分的传统越来越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虽然在秦国各级地方长官皆

有守土之责,但职业武将已经成为军队指挥官的主体。故《韩非子·显学篇》云,“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作为行政主官的“相”与作为职业军官的“将”显然已经有所区分。各级行政官员不一定就是战时的军事主官。军政分离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作为民政组织的“州部”与军队组织的“卒伍”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后者并不依赖于前者产生。

二、《周礼》建军模式与战国秦军制的时代性比较

根据上文列举的现象,可以对《周礼》所见之建军模式的时代性与战国秦军制作对比性分析。总的来说,《周礼》和《国语·齐语》所描绘的建军模式的特点,是利用军人出自同乡同里,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社会组织条件,利用农隙而进行短时间的田猎训练,在战时则自然转化为严整的军事组织,以便于军队能够较为迅速地动员起来,编列成军。《周礼·大司徒》所记之比、闾、族、党,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行政组织。同闾、同族、同党之人要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赙、相宾,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大家族成员。只是在国家权力的整合之下,具有地域组织与血族组织的双重属性。而《国语·齐语》所记春秋前期之齐国军制,“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日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相比之下,地缘化程度比之《周礼》更高,但仍延续着同祭同恤的传统义务。建立在这样带有血亲关系、整齐有序的地方组织之上的军队,在春秋时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正如《国语·齐语》中管子对桓公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但相应的,国家对人口的控制与管理仍然难以绕开宗族渗透到基层。军队组织也不能绕开宗族组织直接编制个人。

但战国之时,军队的参战规模大大超过以往,如《战国策·赵策》载,“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诸侯国疆域的空前扩大,也使各国边防线和冲要重地的防卫武装常备化。战国政权亟需将全国人口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借助授田和案比户籍来控制百姓,普遍地摊派赋、税、兵、徭。商鞅变法恰恰是在秦国“户籍相伍”的基础上,集小乡邑聚为县,将大小不一的宗族组织按官方标准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民政组织。从睡虎地秦简体现的“里”“四邻”“伍人”为代表的基层关系来看,彼此的血亲关系已经很少看到,说明在秦代基层法规当中不再将血亲关系单独作为控制人口的障碍。商鞅变法还打破了正夫和余夫的分别,将全部适龄男子统一纳入国家兵役征发计划。这样就使军队的人员构成也具有越来越广泛复杂的地域背景。同一军中,绝不可能再像《周礼》《齐语》描绘的那样,从低到高各级军队组织都出自对应的行政组织,而是由来自不同地域的、接受过长期训练的义务兵组成各级军事单位。各兵种的人员也完全可以根据专门的军事标准选拔。

根据以上所论,可以从先秦军队组织的发展规律的角度对《周礼》军制与秦军制之间的差异略作分析。先秦军制“寓兵于民”“兵农合一”的基本特质,决定了在早期建军模式中,军队组织很难脱离血族组织、民政组织独立获得发展,从而影响国家军队规模的扩张和军事集权的发展。首先,血族组织对非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具有排斥性,其吸纳族外人口的能力有限,也就不能将大量的族外人口编入本族的军队组织中。其次,军队组织的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那就是要适应战争需要的变化,利用当时所具备的技术条件,以提升战斗力为目标来改进、优化发展军队组织。这一目标的发展方向势必是以个人为单位按作战需要来编组军队。只是在夏商周三代氏族—宗族社会中,国家集权程度不足以绕开宗族来组织民力,因此,这种发展只能在既有的血族组织的框架内完成。统治者需要通过对血亲组织的行政化改造来实现军队组织的变革,军事权力的集中度有限。与西周时期的“族军”相比,春秋时期“作内政而寄军令”^[4]的做法使正规化的军队编组稳定地纳入民政组织,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军队组织在各国变法之前始终不能真正脱离民政组织获得独立发展。与战国时期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出现后,通过全面掌握编户人口,以个人为单位在军内编组的模式相比,还只能是一个发展过渡阶段。由此,对周代军制的变革过程的关注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社会民政组织的发展,由血缘组织逐步发展为地缘组织。二是军队组织的变化,由族军发展为由编户民组成的义务兵。这两条线索长久地统一在一起,相互促进影响,也相互牵绊。故《周礼》“听征役以比居”^[5]的建军模式只可能是对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军队形态的一种追述,而不是战国时期秦国军制的投影。

三、结语

对比《周礼》中军队的组建模式,可以对商鞅创立的秦国军制的历史地位作一评价。商鞅变法在军事上成功就在于他深刻洞察了军队建设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方向,并结合关东诸国变法的经验设计出完整系统的社会变革方案。在寓兵于农的大传统下对周代宗族与村社组织进行改造重建,使集权政府可以直接掌控个体编户民,推行普遍的征兵制度,要求以个人为单位“更代”服役。在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同时,也加速了古代国家向中古社会转型的步伐。秦汉时期军队组建的主流模式,也正是建立在商鞅军制思想的基础之上。反观《周礼》所载之建军模式,恰恰是商鞅要变革的对象。当然,作为一种成功的历史经验与传统,《周礼》中的建军模式在秦汉时代仍留有遗迹。例如,汉初晁错《备边策》中有“五家为伍,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之论^{[11]2289}。其仍向朝廷建议在北部边境按军政合一的方式防卫匈奴,显然受到《周礼》《齐语》传统的影响,但其居民乃由政府迁徙聚合而来,与《周礼》中族、党等家族组织显然不同,且在汉代军队中也不占主流,只是正卒“更代”戍边之外的补充措施。

参考文献

- [1] 钱玄.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75.
- [2]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M].台北:三民书局,1993:27-31.
- [3]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167.
- [4] (三国)韦昭注.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31.
- [5] 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
- [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 [7]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罗开玉.秦国“什伍”、“伍人”考[J].四川大学学报,1981,(2):85-88.
- [9] 吴益中.秦什伍连坐制度初探[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2):73-78.
- [10] 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J].历史研究,1997,(6):23-40.
- [1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Qin Dynasty in Military System

LI Yan-dong

(History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Zhou and the Qin dynasty exists in military system. According to *Rites of the Zhou*, a book on ritual matters of the Zhou dynasty, written 2000 years ago, the king's army was constructed with household as basic unit, namely, each household was obligated to send a man to join the king's army as a soldier and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were constructed on civi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After the Shang Yang reform (a political reform launched by Shang Yang, an important minister of Qin State), in contrast, the Qin state enlisted a man into military service on the list of service-age men nationwide, which means that the army of Qin State was constructed, with individual as basic unit, independent from civil administration agencies.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army building mod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Rites of the Zhou* is similar to that of Qi Stat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us the mode in *Rites of the Zhou* should be viewed a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reform which took place between the late Western dynasty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 words: *Rites of the Zhou*; military system;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St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rmy

[责任编辑 聂颖]